



查屏球 編

梯航集

日藏漢籍中日學術對話錄

復旦大學
古代文學研究書系

陳尚君 主編





查屏球 編

梯航集

日藏漢籍中日學術對話錄

復旦大學
古代文學研究書系

陳尚君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梯航集：日藏漢籍中日學術對話錄/查屏球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1

(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書系)

ISBN 978-7-5325-9011-7

I. ①梯… II. ①查… III. ①經籍—研究—中國—文集 IV. ①Z12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241429 號

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書系

梯航集

——日藏漢籍中日學術對話錄

查屏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蘇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635×965 1/16 印張 28.25 插頁 5 字數 406,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300

ISBN 978-7-5325-9011-7

I·3321 定價：11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言

查屏球

近年來，隨着對外交往的便利，海外所藏漢籍日漸受到學界關注。與20世紀初學人的研究不同，今人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不僅僅是爲了收集稀見孤本殘篇以補本土的不足，更主要是想藉漢籍在異國流傳之事考察中土文化輸出的歷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與其他地區相比，日藏漢籍是一個極有特色的領域。首先，不同於英美各大圖書館只是在近代才進行大規模收藏，漢籍在日本已有較長的流傳歷史，很多經典在日本有自己獨特的傳承史。同時，長期以來，漢籍已成爲日本文化的組成部分，是一直被使用的求知讀物，而不僅僅是作爲收藏品爲少數人所用。這兩個因素決定了日本漢籍在以下幾點上有比較明顯的特色：一是日藏漢籍多存古本，中國本土古籍在流傳過程多有以新替舊的傾向，印本替代抄本，新出版本替代舊版，如《文選》六臣注流行，獨立的五臣注與李善注則不存，《史記》三家注本替代了原有的“集解本”，多是如此。日本對中土文化的接受有時間上的差異，後出新版與原版在時間上常有上百年的差異，因此，一種漢籍傳入後，往往因其古老性而獲得正宗地位，始終能以原貌流傳，不易被後出本所替代，如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抄卷，原初就是慧萼在會昌四年抄回到日本，其後雖有各類明刊本、朝鮮刊本傳入，但是，並未動搖本書在學府的權威地位，它也因此而得保存唐卷原貌。其次，文化環境不同，觀念不同，我棄他取，一些俗世文獻得到了較好的保存。如唐代張鷟《遊仙窟》，自開元年間傳入到日本後就一直流傳下來了，但在中土却因其內容低俗，爲士大夫所不齒，各類官私書志不記，失傳多年。其他還有很多小說、戲曲、禪家文獻的原始版本，也多存於日本，也是因爲

這類書籍長期不爲中土士大夫關注。再次,文化的擴散與傳承有其偶然性,此亡彼存,此輕彼重,在在皆是。長期以來,漢籍在日本具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很多在本土已稀見的書却在日本成爲通行讀物,如裴庾增注《三體唐詩》一書,自元之後很少被人提及,但在日本却成爲習詩者通行的教材。由這些因素看,日藏漢籍應是中土古典文獻學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近代自楊守敬以來,日藏漢籍多爲中土學者所重,形成了一個學術熱點。現在看來,經過前輩學者近一個世紀的淘掘,大規模的發現絕本與孤本之事可能已經不多了,但是,借他山之石攻我之玉的事,仍是需要不斷地做下去的,尤其是古代日本學人關於漢籍的著錄、節錄、引用、改用諸事尤其值得關注,這對於我們進一步了解古代東亞文化體的建構,意義更大。有鑒於此,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於 2016 年 12 月召開了日藏漢籍中日學術研討會,從各個層面展示了這一學術領域有待拓展的學術空間,並推動中日學者進行了較有成效的交流。現將會議論文結集出版,以饗同好。

目 录

前言	查屏球	1
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稿本《錢注杜詩》考		
——李爽氏《“錢牧齋杜注寫本”考》補遺	芳村弘道	1
王梵志詩集在日本		
——兼論山上憶良與杜甫詩的關係	静永健	21
日本五山版《春秋經傳集解》考論	傅 剛	37
爲流播東瀛的每一部漢籍書寫學術史		
——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詳考》序	陳尚君	55
日本近世詩僧文之玄昌所用詩學參考漢籍小考	大淵貴之	68
白居易研究在東瀛		
——以《琵琶行》爲中心	陳才智	79
域外漢籍與施顧《注東坡先生詩》之研究	卞東波	97
五代禪僧明招德謙相關史料及偈頌輯考	金程宇	118
關於日本所藏《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	甲斐雄一	134
王勃《滕王閣序》異文考疏	胡可先 胡凌燕	145
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藏明黃用中注《駱丞集》十卷本考	杜曉勤	166
正倉院古文書所見漢籍書錄及唐逸詩彙考	陳 翀	171
白居易園林文學對日本平安朝漢文學的影響		
——以兼明親王爲中心	高兵兵	199
日傳《白氏文集》古抄卷六十五卷考異	查屏球	220
日藏朝鮮刊五卷本《歐蘇手簡》考	汪 超	249

日藏吳正子箋注劉辰翁評點《李長吉歌詩》簡論	奧野新太郎	266
新發現的幾種《文鏡秘府論》傳本	盧盛江	289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寫本《七經孟子考文》發微	顧永新	305
《群書治要》所載《慎子》研究	潘銘基	320
正倉院文書所見日本入唐寫書資料		
——以第十二次遣唐使為例	王 勇	350
論葉燾與日本文人的交流及其著述	黃仁生	366
明代復古派作品在日本的傳播		
——以泊園書院為主	長谷部剛	374
朱舜水“筆談”資料芻議	朱子昊	382
日本內閣文庫藏《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考	黃冬柏	393
學者入谷仙介與他的藏書		
——以唐代詩人資料為例	高倩藝	439

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 所藏稿本《錢注杜詩》考

——李爽氏《“錢牧齋杜注寫本”考》補遺

芳村弘道(立命館大學)

翻譯：富嘉吟(立命館大學)

一、過去的著錄

這裏所介紹的稿本《錢注杜詩》，即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杜工部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六冊。《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8月)對此本著錄如下：

D006 杜工部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六冊 (唐)杜甫 明鈔本 清道光三十年陸僕手跋 鈐柳隱如是、季滄葦藏書印、陸沆字冰簟、陸僕字樹蘭、吳門陸僕一字樹蘭之印、名余曰僕、陸樹蘭印記(陸僕手跋錄文省略)。

據此可以認為，此本是杜甫集的無注白文本。然而查閱原書，發現此本却是一個有注本。並且可以判明，是由清人錢謙益(明萬曆十年〈1582〉—清康熙三年〈1664〉)所做箋注。筆者分別於2015年4月、2016年4月兩度閱覽、調查此本。其後方才得知，李爽氏在《杜甫研究學刊》2013年第一期(總第一一五期)發表《“錢牧齋杜注寫本”考》一文，已對此本做了介紹。今年九月，李氏《〈錢注杜詩〉研究》經由上海古籍出版

社出版，將此文作為第一章《〈錢注杜詩〉版本研究》第二節《“錢牧齋杜注寫本”考》的“一、‘錢牧齋杜注寫本’版本價值初探”部分。然而，李氏的論文僅僅利用了原書一部分的複寫，筆者的調查則對其中的缺漏有所補充。以下，主要選取本人調查的內容，試對此本的價值做一番闡述。

上述《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著錄中有關舊藏者鈐印的部分，僅僅列舉柳如是、季振宜、陸沆、陸隴其若干人。除此以外，還有“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朱文、白文方印兩枚。“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成立於1925年（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是以庚子賠款為運營基金、以推進日中共同文化事業發展為宗旨的組織機構。1927年（昭和二年、民國十六年），委員會下屬又設立了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該研究所為籌備圖書館的創立，設置“東方文化圖書籌備處”，昭和九年（1934）二月改稱圖書部，圖書購入“由圖書籌備委員狩野直喜博士及圖書籌備評議員李盛鐸、傅增湘兩氏評議決定”（今村與志雄編《橋川時雄的詩文與追憶》所收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并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便覽》，汲古書院，2006年6月，185頁）。根據此本有“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的鈐印這一事實，可知其曾為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檢《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簡目》（臺北，進學書局出版，古亭書屋經售，1984年影印民國二十七年排印本，改題《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集部·別集類”著錄有“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錢謙益注 舊鈔本 二〔函〕六〔冊〕五八七三〔號〕”。由此明確可知，此鈔本並非無注本，而是錢謙益的注本。所以著錄為“杜工部詩集”，大概是依照卷一首行的書名而來。然而，此後卷題均作“杜工部集”，就內容來看也並非“杜工部詩集”。此本至卷十八止所收為詩，卷十九、卷二十所收則為文。因此，《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杜工部集”這樣的著錄，是較為合適的。拙文稱之為“稿本《錢注杜詩》”，完全是出於便宜。

又，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卷一二（中華書局，1983年，第1035頁）著錄此本如下：

杜工部詩集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錢謙益箋註。

清寫本，十行二十字。異字注本文下，注文在每首詩後。蓋錢牧齋杜注寫本也。

收藏有“柳隱如是”朱白文、“陸沆字冰篁”、“陸僕字樹蘭”各印。後有陸僕手跋（錄文略。後文引錄）。（庚午）

傅氏《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1993年）卷一二上、第92頁，也可見如下的記載：

杜工部詩集二十卷（以下小字雙行）唐杜甫撰、清錢謙益箋註。○清寫本，十行二十字。異字在本文下，注文在每首之後。鈐柳隱如是、陸沆、陸僕印。有道光三十年陸僕手跋，言據其高祖點勘樓書目，此書為康熙四十六年得之太倉王氏。

《藏園羣書經眼錄》文末提及的“庚午”，是編纂者傅熹年氏推測傅增湘觀書的時間而添加的。這裏的“庚午”，可以視為民國十九年（1930）。傅增湘曾擔任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籌備評議員，應當是在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閱覽此本。

《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定此本為“明鈔本”，大概是依據陸僕手跋（參見後文引錄）“右杜工部集一部，為明人鈔本”而來的。然而，當以傅增湘“清寫本”的判斷為是。錢謙益於明崇禎六年（1633）所著《讀杜小箋》及次年所著《讀杜二箋》，是對杜詩的部分箋注。與之相對，此稿本抄錄作品全文並對其進行箋注，其內容與錢謙益歿後三年、即清康熙六年（1677）刊行的所謂《錢注杜詩》大致相近。由此可知，此稿本是入清以後完成的。此外，此稿本中可見錢謙益的愛妾柳如是（萬曆四十六年〈1618〉—康熙三年〈1664〉）的印記。若此印記為柳氏所鈐，則此本可以被視為在柳氏辭世的康熙三年（1664）六月二十八日（顧苓《河東君小傳》）以前抄錄的。根據季振宜（崇禎三年〈1630〉—康熙十三年〈1674〉）在《錢注杜詩》刊行之際所附《序》中“極年八十，書始成”的記

載,《錢注杜詩》的脫稿時間應當是在錢謙益年屆八十之際,即順治十八年(1661)^①。由此可見,此本是在脫稿後的三年間抄錄完成的。

二、概 要

有關稿本《錢注杜詩》的形態、內容構成及遞藏的情況,約略記述如下。

此本形態如下。書封爲淡黃褐色,高 25.8 釐米、寬 16.8 釐米。無題簽及署題,書根處有墨書“杜工部集”。爲同一人所完成的精鈔本。所用紙張多見拼綴痕跡。全幅高 20.4 釐米,寬 13.2 釐米,無界綫,正文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行十九字。中心記頁數,不記書名、卷次。首冊正文之前有襯裝(第二冊以下無襯裝)、護葉兩頁。不附序跋及目錄。正文首行作“杜工部詩集卷第一”(卷一尾題及卷二以下,首尾題均作“杜工部集卷第幾”),次行低一格作“古詩五十二首天寶末亂時并陷賊中作”,第三行低兩格作詩題“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第四行以下頂格作詩作正文。正文後低一格附雙行小注(詞條單獨成行)。一般情況下,首行書名之後,次行應記有編撰者(原編撰者)姓名或注者姓名,此本却全無此類記述。而季振宜靜思堂刊本《錢注杜詩》(內封面題“錢牧齋先生箋注杜工部集”,以下稱“刊本”,以臺灣大通書局《杜詩叢刊》影印本爲底本),首行題“杜工部集卷之一”,次行即低七格題“虞山蒙叟錢 謙益箋注”。

如上文所述,此稿本共六冊,各冊所收卷次如下:

首冊	卷一—卷四	第二冊	卷五—卷七
第三冊	卷八—卷十	第四冊	卷十一—卷十四
第五冊	卷十五—卷十八	第六冊	卷十九·卷二十·附錄

^① 據葛萬里《清錢牧齋先生謙益年譜》(《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一三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所收《國粹學報》第六五期)。又,金鶴翀《錢牧齋先生年譜》(《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亦作順治十八年。

其編次方式，卷十八以前爲詩、卷七以前爲“古詩”、卷八以後爲“近體詩”，在分體編次的基礎上，再依據杜甫行年事跡的先後編次。卷十八尾題後有“杜工部集卷第十八附”一行，次行以下有“他集互見四首”“吳若本逸詩七篇”“草堂詩箋逸詩拾遺”。刊本卷十八末改行低一格題“附錄”，次行以下有“他集互見四首”等同樣的内容。卷十九爲“表賦記說讚述十二首”，卷二十爲“策問文狀表碑誌十七首”。卷二十尾題“杜工部集卷第二十”後，空一行、低一格題“附錄”。“附錄”起始收錄《誌傳集序》（編次順序與刊本不同，末尾可見刊本未收資料二種），其後列“新書藝文志別集類”“晁公武讀書志”所著錄《杜甫集》及“黃長睿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三則、“校讎杜集諸本”（校本五種的解題）。這些杜集解題，均未爲刊本所收錄。另外，還有《少陵先生年譜》（首附“世系”）、《附宋高宗授杜甫裔孫杜邦傑承節郎敕》（刊本未收）、“唱酬題詠”^①、“諸家詩話”、“注杜詩略例”。“附錄”内容多見與刊本不同之處，且有不少珍貴的資料，詳見下文敘述。此外，此稿本中作爲“附錄”收錄的内容，刊本中除了附在《少陵先生年譜》末尾的部分之外，均置於錢謙益、季振宜二人的序與《杜工部集目錄》之間，順序爲“諸家詩話”“注杜詩畧例”“唱酬題詠附錄”“杜工部集附錄”。

卷二十末葉有低五格墨書題識一行，作“道光庚戌重裝并繫以跋”，右側有“蘇臺/陸僕”白文方印，綴葉部分貼有長片白紙，上有“季滄葦/藏書印”的朱文長方印。後加護葉，上有陸僕手跋。根據原文行格抄錄如下^②：

右杜工部集一部爲明人鈔本惜無款識查高大父
點勘樓書目康熙丁亥秋仲於太倉王氏得明鈔
杜集六冊卷端有柳如是圖記即是集也爰付重裝
并志數語于卷末皆道光庚戌三月十三日吳邑

① 自高適《登慈恩寺塔》至韓愈《調張籍》詩，共收錄十四篇。刊本題作“唱酬題詠附錄”，又據《末陽祠志》錄《裴說一首》《孟賓於一首》附於十四篇後。

② 上述《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古籍題跋輯錄》、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亦錄陸僕手跋。

陸僎記於洗馬里之東臯草堂 “名余/曰僎”“陸/樹蘭”(均爲白文方印)

其後有“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白文方印、“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朱文長方印。其他印記如下：

第一冊首葉有“柳隱/如是”陰陽文方印、“陸僎字/樹蘭”朱文方印、“陸沆字/冰簃”白文方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朱文方印、“傅斯季/圖書館”朱文長方印、“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朱文長方印，末葉有“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朱文方印(與首葉鈐印不同)、“史語所收藏/珍本圖書記”朱文長方印(各冊末葉同)。第二冊以下首葉有“吳門陸/僎字封/蘭之印”白文方印、“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朱文方印、“傅斯季/圖書館”朱文長方印。

根據這些印記、識語及跋文，可知此本在入藏傅斯年圖書館以前，爲明末清初時人錢謙益的愛妾柳如是所藏，後轉入季振宜手中。至清代後期，又爲蘇州藏書家陸沆、陸僎兄弟所有。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經陸僎重裝，其後入藏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此外，根據陸僎手跋，此本最初爲康熙四十六年(丁亥，1701)其高大父自太倉王氏手中獲得。其遞藏過程可簡單歸納如下：

錢謙益→柳如是→季振宜→太倉王氏→陸沆、陸僎高大父陸氏→陸沆、陸僎→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①

此外，此本雖曾爲季振宜所藏，但其內容與刊本存在差異，並非刊刻時所採用的底本。

① 李爽氏《〈錢注杜詩〉研究》第二節《“錢牧齋杜注寫本”考》“二、‘錢牧齋杜注寫本’遞藏源流考”部分，詳細論述了此本的傳來過程。

三、“附錄”中的刊本未收資料

上文提到,此稿本“附錄”中存在刊本未收的資料。以下,僅列出其中重要的內容。

1. 吳若本的列銜

錢謙益在《注杜詩略例》中,認為“杜集之傳于世者,惟吳若本最為近古,他本不及也”,並在此基礎上,以家藏的吳若本作爲箋注的底本。吳若本是杜甫集的重要版本之一,然而遺憾的是,順治七年(1650)毀於錢謙益藏書樓(即絳雲樓)的火災中。錢曾《述古堂藏書目》(粵雅堂叢書本)卷二著錄有“杜工部集吳若本”,今已不存於世,只能通過《錢注杜詩》間接了解其狀況。僅此一點,便可以認為《錢注杜詩》有着極高的學術價值。這已爲諸家研究多所論述,這裏不再贅言。

此稿本“附錄”的“誌傳集序”中,錄有吳若的跋文。刊本題此跋文爲《杜工部集後記》,以“右杜集建康府學所刻板也”始,以“紹興三年六月荆溪吳若季海書”終。刊本僅僅收錄了《後記》正文,此稿本則在正文後另有“建康府府學/今剏行雕造唐工部集一部凡二十卷”兩行(“唐”字當作“杜”,或下缺“杜”字)。其中提到吳若本爲二十卷,正與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二“杜工部集吳若本二十卷,四本,宋本影抄”的記載相同。兩行後空三行,裏葉列銜七行如下:

左從事郎建康府觀察推官	王 閻
右承直郎建康軍節度推官	章 識
左迪功郎建康府府學教授	錢壽朋
右朝散大夫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趙士鵬
左承奉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事	吳 若
左奉議郎通判建康軍府事	吳公才
降授右朝請郎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軍府事兼江南東路安撫使	歐陽懋

這些列銜詳細記述了南宋初年的紹興三年(1133),建康府學刊行吳若本《杜甫集》時與事的官人名錄。吳公才、王閻、錢壽朋的名字已見於《後記》正文之中,歐陽懋、趙士鵬、章識則未為《後記》所提及。即使名字見於《後記》之中,包括吳若在內諸人的官銜也無從得知。有關吳若的仕履,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8頁)及孫微、王新芳《吳若本〈杜工部集〉研究》(《圖書、文獻與交流》2010年第三期,總第一三五),都依據《宋史》卷三七〇《呂祉傳》考訂其為建康府通判府事。上文的列銜證明了這一結論的正確,同時還表明了其寄祿階為左承奉郎。末尾所附建康府知府歐陽懋,其任命一事見於南宋張綱《華陽集》卷一《歐陽懋除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

洪業氏在《杜詩引得序》(哈佛燕京學社,1940。Taipei,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ids Service Center, 1966 影印)中,曾列舉十條疑點,論證吳若本為錢謙益所造偽書。然而,洪氏其後所作《再說杜甫》(《清華學報》新一〇卷第二期,1974。後收入《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中,引用了張元濟的一段跋文。跋文是商務印書館影印上海圖書館現藏《宋本杜工部集》為《續古逸叢書》第四十七時所作,考證此本為王琪本、吳若本的配本。洪氏接受了張元濟的這一結論,並明言前說有誤。如果洪氏有機會得見此稿本“附錄”中吳若本的列銜,恐怕從一開始就不會疑心錢謙益偽造了吧。

2. 《唐授左拾遺誥》

此為上述列銜次頁所錄刊本未收資料。李爽氏直接依據稿本,介紹“附錄”中《少陵先生年譜》末尾的“附宋高宗授杜甫裔孫杜邦傑承節郎敕”。但他並未見到《唐授左拾遺誥》一文,僅僅轉引了刊本《錢注杜詩》卷二《述懷一首》注中的引文。李爽氏還引用了乾隆《平江縣志》卷二二《古跡志》中的“杜氏遺敕”及卷二三《藝文志》中明人陳塏的《跋杜氏誥敕》,對唐宋時期兩種敕書的形態等作了介紹。又利用了明代方志中所記載的與錢謙益有關的新資料,對其注釋杜詩的學術意義有所言及。此外,有關湖南省岳陽市平江縣杜甫墓的資料,備見於清末李宗蓮所編《湖南平江縣重修唐杜左拾遺工部員外郎墓并建祠請祀集刊》(光緒十年)。其中

雖錄有題名為《附子美公誥敕》的唐敕，却對原文的書寫格式做了顯著的改變。此稿本中所錄《唐授左拾遺誥》如下（原文行二十字），文本內容與《述懷一首》的對應注文相同（以下所引稿本文字，所附句讀為筆者所加）：

唐授左拾遺誥

襄陽杜甫，尔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為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

中書侍郎張鎬齎符告諭

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

右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五寸許。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乾隆《平江縣志》卷二二《古跡志》所收《誥》文，“中書侍郎張鎬云云”一行作“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齎符告諭故敕”，次行的年月日末尾無“行”字。所謂“右敕云云”，則是對明代本省參政陳壇《跋杜氏誥敕》中以下內容的摘錄。

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二月，予駐嶽陽之平江閱縣志，載有子美為左拾遺敕及其裔孫杜邦傑為承節郎敕，云尚存於縣市民杜富家。亟命求其家得之。子美敕為唐至德二載所授，邦傑敕為宋紹興三十二年所授。文皆簡古，真敕語也。唐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尺，厚如錢，故久存。字大二寸許，偃而勁。年月有御寶，方五寸許，色轉沈，中有碎裂，而全者皆為蛇文矣。

編纂於同治八年（1869）至光緒元年（1875）的同治《平江縣志》卷八“冢墓”中，引錄了清代鄉人李元度的《杜墓考》。文中提到了唐宋時期《杜氏誥敕》的存在及陳壇的跋文，並有“錢氏謙益亦謂，今岳州平江縣民杜富家猶藏拾遺”的記載。考慮到平江人李元度不可能見到稿本《錢注

杜詩》,“錢氏謙益亦謂”以下的部分大概是根據刊本的注釋而來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錢注杜詩》與《初學集》《有學集》等一同被列入禁燬書中。官修同治《平江縣志》中出現錢謙益的名字並引用其論說,表明清末禁燬令的逐漸弛緩。根據李爽氏《〈錢注杜詩〉決定性突破清廷禁燬令考述》(《杜甫研究學刊》,2009年第四期,總一〇二期),這一現象的出現,與太平天國運動及湘軍(即漢人)力量在滿清政權內部崛起這一歷史背景有關。

3. 杜集著錄解題三則

上述2、《唐授左拾遺誥》後記載有關於《杜甫集》的三則文字,同樣不見於刊本《錢注杜詩》。其一引用《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如下:

新書藝文志別集類

杜甫集六十卷 小集六卷

潤州刺史樊晃集 通志略同(此行小字)

其二引用《郡齋讀書志》著錄如下:

晁公武讀書志

杜甫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注杜詩二十卷,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趙次公注杜詩五十九卷。

晁氏曰:宋朝自王原叔以後,學者喜觀杜詩(筆者按:衢本《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卷二三二作《喜觀甫詩》、袁本作《喜杜詩》)。世有爲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託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當作“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體(各本無“體”字)雜次第之,且爲之注。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誤”下、各本有“字”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四庫本